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略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反异化主题

刘亚律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哈姆莱特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与邪恶世界的冲突是整个《哈》剧的中心。然而邪恶世界本身却是人文理想异化的产物,它具体表现在人欲的异化、人智的异化和道德的异化三个方面。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莱特与之进行了孤独的抗争。由于主人公自身亦显露出自我异化的蛛丝马迹,斗争只能以同归于尽而告终,通过这样的结局安排,寄托着剧作家深沉的反异化思想。

关键词:人文理想;异化;抗争;反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35X(2002)01-0047-04

以“四大悲剧”而奠定其在世界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莎士比亚,不但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以戏剧艺术表现“异化”现象的先驱。当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大学才子派”剧作家马洛等等,还在竭尽全力为人文主义理想摇旗呐喊之际,莎士比亚已以其天才的睿智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与人文理想异己时代的来临。正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在一切方面都不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而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1](P214)莎士比亚的剧作与“异化”主题的密切关系已为评论界所注意。如一位美国学者认为,“孤独,异化,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这类主题”,除了见于古希腊文学之外,也“见之于莎士比亚的若干剧作之中”。[2](P3)波兰学者杨·柯特在讨论《李尔王》时指出,由于赖以支撑人们信念的“诸神和他们在世上的秩序并不存在”,葛罗斯特自杀前的抗议就失去了意义指向,他的自杀“在实际以及在形而上学的级别上说只是骗人的”,《李尔王》的“整个局势也是怪诞的”,是在“等

待没有来的戈多”[3](P544-545),从而将《李尔王》的主题同荒诞派的精神实质联系起来。我国学者也有类似论述,如徐葆耕先生认为,《李尔王》揭露了“权力”的异化如何导致“父放逐女,女杀死父,兄弟仇杀,姐妹相残”[4](P410),《麦克白斯》则“深刻地表现了麦克白斯夫妇被自己的权力欲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痛苦和绝望”[5]。诚然,囿于时代历史的局限,很难说莎士比亚有多么自觉的反异化意识,但莎剧与异化现象的密切关系却客观上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本文试以《哈姆莱特》为例来讨论其反异化主题。

“异化”(alienation)的本意是“转让”或“出卖”,最初在“转让”的意义上使用“alienation”一词的是卢梭。到了近代,“异化”这个概念被普及化,成为了一个应用范围广泛,使用频率颇高的术语,举其要者有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前者以为万物皆由抽象理念产生,个别来自一般,具体源于抽象,他将这种产生与被产生、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变化称为异化;后者则从无神论观点出发,认为“上帝”之所以

收稿日期:2001-10-26

作者简介:刘亚律(1970-),男,江西南城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

“全能”，乃是因为人将自己思维的、意志的和情感的力量赋予了上帝而失却了自身的力量，“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已。马恩经典作家在对“异化”的言说上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神秘而抽象的思辨色彩，将异化现象同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分析。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造成了劳动产品与工人劳动相对立的“物的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雇佣工人的“自我异化”（工人的个体生命与自身生产活动的对立），因此要消灭异化现象，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剥削制度。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异化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重的辩证关系。一是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即一事物或状态从另一事物或状态中衍生发展；另一是对立关系，即两事物或状态之间相互抵触，新生事物或状态向着母体愿望的对立面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母体”并不等同于已经丧失自身存在的根据，行将灭亡的事物或状态，恰恰相反，在它们身上凝聚着的是主体肯定性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唯其如此，“反异化”的意义才能在学理和情感的双重层面上确立起来。

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经原始积累后有了长足发展，资产阶级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虽然暂时未能取得政治生活的领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伴随文艺复兴运动而来的资产阶级人文意识、价值观念不曾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心态。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为欧洲摆脱长达千年的教会绝对精神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精神原动力，人们有理由对这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充满期待和信心。可是，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里，人们惊异地发现，人文理想居然走向了它初衷的对立面，它驱赶着这样一头“怪兽”的来临：“这个正在前进中的世界将会是个金钱统治的世界，压迫和剥削群众的世界，大力放纵个人主义，充满贪婪等等的这个世界。”[3]（P484）

哈姆莱特的复仇并非用“父仇子报”这样简单的字眼所能概括，因为这样一来便将王子复仇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场充满血腥气息的宫廷仇杀，从而抹杀了复仇的实际意义：实现人文主义者“重整乾坤”的崇高理想。既是“重整”，则意味着此前的某一时期并不“颠倒混乱”。很显然，这一时期应该是老哈姆莱特当政时期，他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状态的“人”，从哈姆莱特对乃父的评价中可以揣摩

出些许端倪：“他是个人！真叫是尽善尽美，我再也不会见到他那样的一个。”连一贯稳健持重的霍拉旭也由衷地赞叹：“他是个极好的国王”[6]（P21）。他统治的国家自然是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国度，他与王后葛忒露德的婚姻亦被视为完美与和谐的象征。既如此，哈姆莱特所面对的那个邪恶的世界又来自何方？其动力源泉何在？笔者以为，由于人文理想并未实现其初衷，反而向它的对立面转化，邪恶世界就是这个对立面的具体化与现实化。

人类理想的内涵之一是对人性的提倡，藉此来对抗中世纪压抑人、束缚人的禁欲主义。人性的提倡在文艺复兴时期集中表现为对人的自然官能的肯定。在卜伽丘《十日谈》和拉伯雷《巨人传》那里，人的自然情欲是如此的生机勃勃与充满活力，以致同死气沉沉，充满灰暗色调的中世纪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阴沉的世界才显示出盎然生机。可是到了《哈姆莱特》中，个人情欲的满足居然首先异化为克劳迪斯弑兄篡位的罪恶动机之一。鬼魂感叹：“为了满足他极端无耻的兽欲，骗上了我那位最显得贞洁的王后。”[6]（P37）然而，天真的老王哪里知道，“最显得贞洁的王后”并非如他想象中那般“贞洁”，炽热的情欲之火早就轻易地将他们的爱情盟誓烧得个一干二净。出于一己私欲的满足，葛忒露德不等“送葬去穿的鞋子穿旧”，“不等她假仁假义的眼泪干了，不等她热辣的眼睛消去了红肿”，就“轻捷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6]（P19-20）。情欲的“孽火使半老女人的骨髓里起得了蠢动”，“贞操变成蜡投给了青春的烈焰”，“理智都替淫欲跑腿了！”[6]（P115）

人文主义的内涵之二是对人智的肯定。在漫长的中世纪，人匍匐在绝对者的脚下，无条件地听命于上帝。在他们思想意识里唯一要做的，就是对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假思索的认同，就是对上帝无须证伪的先验存在的信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自然科学成就的突飞猛进，人的精神视野得以极大扩充，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巨大威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对智慧的力量充满乐观主义信心。《巨人传》里庞大固埃最终找到神壶，《堂吉珂德》里桑丘·潘扎在海岛的斐然政绩，皆被视为是人的智慧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体现。然而，在奸王克劳迪斯那里，聪明才智却异化成为他达到罪恶目的的手段。他亲手谋杀王兄，

却用“一个虚构的死因，恶毒万分，把丹麦全国的听闻一手遮掩了”；他“诡计多端，花样百出”[6](P37)，干出乱伦的无耻勾当，凭借的就是他那“邪恶的才智”；他打发哈姆莱特去英国，暗施借刀杀人之计；他巧舌如簧，鼓动报仇心切的雷欧提斯与哈姆莱特决斗，设置毒剑与毒酒的“双保险”，必欲置哈姆莱特于死地而后快，其心机之缜密歹毒着实令人震惊。

如果说王后葛忒露德代表着人欲的异化，奸王克劳迪斯体现了智慧的异化，那么罗森克兰兹与吉尔顿斯丹的选择则体现了道义的异化。罗、吉二人与哈姆莱特从小一块受教育，既是少年伙伴又彼此熟悉脾气，“再也找不出两个人比你们同他更好。”既为好友，维护彼此友谊，关键时刻互相帮助方为正义，何况哈姆莱特乃未来王位的接班人，以罗、吉二人之聪明，应不会不明白此中的利害关系。退一步讲，就算他们不以友情为念，也大可置身事外（他们其实并未置身矛盾斗争的核心），而无需厚彼而薄此。可他们却趋炎附势，为巴结讨好奸王而置道义友情于不顾，甘愿充当奸王的耳目与工具。罗、吉二人弃义附势之举决非单个孤立存在现象。哈姆莱特的一席话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他注意到，“我的叔父竟是丹麦国王了，而且当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还一直对他（指奸王）做鬼脸的那些人，如今都愿意出二十块，四十块，五十块，一百块杜开来买他的一枚小画像了。”[6](P67)弃义而趋利就这样转变成为了社会的普遍价值选择。

上述内容只是人文精神走向异化的诸种表现。要明确《哈姆莱特》的反异化主题，还必须确立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地位。这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却引起学术界较大的争议。应当说以往在论证哈姆莱特为人文主义者时，确实存在牵强附会的地方。比方说，因为哈曾留学号称德国人文主义思想发源地的威登堡大学，就被认定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进而断定他是一位理想的人文主义者。依此逻辑，雷欧提斯亦曾去过奢华堕落的巴黎，那他必定堕落无疑了。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倘据此认定哈姆莱特不是人文主义者，似也有武断之嫌。因为正是他，在人类被视为上帝羔羊的时代，高擎人道主义大旗，将人提升到与神并列的地位，认为只有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多么了不起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

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6](P65)他博学多才，勇武过人，有着“朝廷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他是“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6](P86)，简言之，哈姆莱特具有人文主义者一切必备的素质。如果说以上引文主要出自自我菲利娅之口，难免带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溢美成分，那么来自他的不共戴天仇人克劳迪斯的评价当是真实可信的。第四幕第七场里，奸王与雷欧提斯策划用卑劣手段谋害哈姆莱特时曾说道：“他为人不拘细节，一向大方，没有一点鬼心眼。”[6](P152)其言下之意是在暗示和怂恿雷欧提斯，为他实施阴谋计划打气，间接地却为我们显露出哈姆莱特信念中真实的一面。倘若将缺乏“鬼心眼”简单地归结为心智的缺乏，恐难令人信服，因为仅从巧设戏中戏、智调国书二事便可看出哈姆莱特并非不通谋略之辈，既如此，奸王的此番言语只能解释为以前的哈姆莱特对于人，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持乐观主义的态度，有着充分的信心，以致思想深处压根就没有对人存在防范意识。

指出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其思想意识产生某些动摇、怀疑甚至虚无的成分，重要的是看产生这些成分的成因。在戏中，我们看到，“天神似的”老王一朝暴卒，王后葛忒露德不出一月就“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奸王即位（尽管此时他的罪行尚未证实），连多年的老同学也蜕变为奸王的耳目与工具，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来到哈姆莱特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意志再坚强的人也难免会埋怨命运的不公，哈姆莱特流露些虚无消极的看法应在情理当中。明乎此，我们才不会对紧接在“人文主义”宣言之后的这些话感到不知所措：“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6](P65)“如果睡眠（即死亡）就等于了结了心痛及千百种身体要忍受的皮痛肉痛，那该是天大的好事，正求之不得啊！”[6](P82)换言之，不能把哈姆莱特因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而引发的暂时迷茫现象当作本质，不能因人处于巨大压力之下有暂时的异常反应而否定其思想主流。比如高乃依的古典主义名剧《熙德》的男主角罗狄克，在面对个人感情与家族荣誉的尖锐冲突时，亦曾企图以自杀来躲避必须作出的二难选择，然这并不曾影响他成为一个果敢的英雄形象。同样，在《十日谈》里对人的自

然情欲百般肯定,对封建教会的虚伪与贪婪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卜伽丘,晚年迫于压力创作了传奇《大鸦》,“诅咒爱情是肉欲的放纵,贬斥女人是万恶之源”[7](P69),与《十日谈》为女性而写作的宗旨相去何止万里,[8](P5)难道我们能据此否认卜伽丘的人文主义者地位?

一边是“礼崩乐坏”充斥着赤裸裸欲望的罪恶世界,一边是肩负着“重整乾坤”重任的孤独个体,那么这一个体在面对此等世界时是否采取了反抗行动呢?答案是肯定的。莎士比亚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哈姆莱特从消极到积极的反抗历程。遭遇突如其来惨剧,哈姆莱特的第一个反应是逃避,远离艾尔西诺这个是非之地,重返威登堡。其次才是自杀。“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天经地义并没有一条严禁自杀的戒律。”[6](P19)接下来的行动不仅连贯如一,而且一改此前疲沓犹豫的慢节奏,变得快捷迅速起来。他先是装疯卖傻企图麻痹奸王,然后利用疯癫做掩护,一手导演了“捕鼠机”这出戏中之戏,巧妙地印证了鬼魂所言非虚;他对母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礼劝其迷途知返,要她“好好地忏悔过去……不要给满园子莠草再施上肥料使它们更蔓延了。”[6](P118)哈姆莱特此举当然不无出于亲情考虑的成分,更包含着从邪恶世界内部打开一个缺口的深层考虑,最后他手刃奸贼,大仇得报,尽管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哈姆莱特对邪恶世界的孤独反抗总体上是连贯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曲折性。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实际上是回答哈姆莱特何以“延宕”的问题。自1736年托马斯·汉莫提出该问题以来,对“延宕”原因的探究一直是《哈》剧评论中的核心,对此的理论性阐释也不下十余种。前文已经说过,王子复仇总体上呈连续性,所谓“延宕”,恰好证明王子复仇计划的深谋远虑。因为不顾现实的情况而手刃奸王,凭意气而行事,固然痛快淋漓,但却只能是莽撞与蛮干,而非真正的战斗。要知道,奸王虽然弑兄篡位,叔嫂乱伦,谋杀亲侄,罪恶滔天,然这一切毕竟不为外人知晓,而他的王位却经隆重的加冕仪式而为朝臣和民众所接受,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就贸然行事,可以想见,那本属奸王的篡位罪名就将落在哈姆莱特身上,更何况鬼魂之言真假难辨,如果其言为假而铸成大错,对于整个王族岂非是雪上加霜?这样一来,“重整乾坤”又何以谈起?对哈姆莱特来说,重要的

依据,它一要能与鬼魂之言相印证,二要能让公众深信不疑。“戏中戏”虽然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于后者却无甚意义。这就是哈姆莱特为什么直到雷欧提斯道出真相后才断然出手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姆莱特》具有双重的反讽意味:一方面是现存的冷酷世界与曾经辉煌的人文主义梦幻世界(也就是要重建的世界)相对立,曾几何时,这个梦幻的世界“作为来自未来的遥远的空想的目标放射着诱人的光辉”[3](P492),令人惊异的是,前者居然从后者的母腹中孕育;另一方面,哈姆莱特肩负着“重整乾坤”的重任,承载着全部的希望,人们却又隐隐地觉察到,这位重任的担当者也存在着“自我异化”的蛛丝马迹。弗洛伊德和琼斯曾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出发,认为哈姆莱特之所以拖延复仇,是因为叔父替他做了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杀父娶母!男性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俄狄浦斯情结”尚有待于时间的证明,不过他们发掘哈、克二人潜意识共通之处的研究角度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我们惊异地发现,在觊觎王位这一点上,哈姆莱特潜意识深处确实浮泛着一丝与克劳迪斯如出一辙的东西:“我非常骄傲,有仇必报,野心勃勃;随时都在转的大逆不道的念头……我们都是十足的流氓;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6](P85)这段哈姆莱特与莪菲利娅的对白看似癫狂却很有意思,恰好与他在另一场合的一番话相印证。第三幕第二场里,罗森克兰兹揣摩到哈姆莱特的疯癫可能与未能继承王位有关,便安慰他道,国王已“亲口宣布立殿下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意谓只要假以时日,即位只在早晚之间。哈姆莱特情不自禁地回答说:“不错,只可惜‘等到草长足,瘦马变枯骨’。”[6](P104)迫不及待的心理不是跃然纸上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既然哈姆莱特难以忍受克劳迪斯对王位的霸占,他对当初父王在位也未必就有足够的耐心,也很难保证不会转“大逆不道的念头”,前面所引的他与莪菲利娅的对白,极可能是真实的心态的自然流露。由这样的人来力挽狂澜,再造乾坤,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退一步讲,就算他大仇得报,心愿得偿,乾坤得以再造,这个乾坤能否恢复到以前的理想状态,也是大可怀疑的。我想,也许这就是莎士比亚在戏剧结束时,让好人坏人一起尸陈舞台的原因:既然好人自身也开始了异化,其获胜自是难以令人信服,坏人当道毕竟有违天理,(下转第55页)

和评注多侧重于文章的作法,有所局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为初学者提供了实际的写作技巧,指明了入门途径,的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迄今,《文章规范》最初的功利性目的已不复存在,但作为指导写作的辅助读物,它仍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陈望南.谢枋得和《文章规范》[J].中山大学学报,1996,(2).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春秋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章学诚.文史通议·文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Study On Xie Fangde's "Wen Zhang Gui Fan"

ZHANG 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ichuan Teachers College,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Xie Fangde's "Wen Zhang Gui Fan" was a book of selected articles and commentaries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whole book emphasizes the writing of articles to help beginner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rticle and grasp the writing skills. Most of the selected articles of the book have good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artistry. The comments are exact and to the point. The literary propositions expressed in the selected articles and commentaries are good. The book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use the literary propositions to appreciate and write articles.

Key words: Xie Fangde; "Wen Zhang Gui Fan"; book of selected articles and commentaries

(上接第 50 页)

那就让他们同归于尽吧! 而把美好的希望留与后来人,留与人间。

[参考文献]

- [1] 鲍桑葵.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许汝社.异化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异化观[A].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7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 杨·柯特.《李尔王》,最后一局[A].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4] 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5] 肖明翰.文学中的异化感与保守主义[J].外国文学评论,1994,(1).
[6] 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 卜伽丘.十日谈·原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A Little Brightness in the Dark Kingdom

—On William Shakespeare's *Hamlet* and Its Anti-alienation Subject

LIU Ya-lü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Hamlet is a humanitarian. His conflict with the evil world is the core of the play. However, the evil world itself is alienated from the humanism ideas. It includes the alienation of the sexual passi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wisdom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moral character. As a humanitarian, Hamlet fights with it lonely. Since the leading role himself is just becoming alienated, the result is nothing but that both sides end in common ruin. The play places the writer's anti-alienation ideas on this arrangement.

Key words: Humanism ideas; alienation; fought; anti-alienation